



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廊房头条 海达 摄



清军之新军士兵

这是清末出版的一张明信片，这套明信片共有27张，片中的法文标题为“小职业——中国士兵”。在这一“小职业”系列中，还有石匠、木匠、小贩等等，这反映了外国人的某种眼光。图中应为清军的新军士兵，似乎摄于值勤站岗时。

(方霖)

老照片

目 录

陈 煄 我的伯父罗稷南 1

权力、金钱和特殊的情势，都可构成社会对人的强制，而当面对这些强制的时候，能否根据自主的意识做出负责任的选择，则是一个人是否成其为“人”的重要尺度.....

周启博 噩梦醒来已暮年 14

谢 泳 50年代的周一良 22

一介书生的荣辱沉浮，也是被时代所裹挟的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宿命.....

邵 建 民国十八年的“故事” 27

范 淳 泰山无字碑：从无字到有字 38

孙中山曾将中国向民主社会的过渡，依次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1928年国民党在完成北伐之后，即自上而下地推行“训政”，但人们很快便发现，所谓“训政”，不过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代名词.....

嘉 薜 罗清奇 海达的老北京照片 49

当我们为老北京的消失而痛心时，一个叫海达的德国女摄影师拍摄的老北京照片，给予我们轻轻的抚慰.....

王 涵 清华的早期建筑 59

周庆冬 旧时的博山县考院小学 67

史耀增 也是一种时尚 70

张 鸣 “清队”档案中的老妇人 73

老照片

《老照片》丛书

邢小群	丁玲与陈企霞	77
黄伟经	难忘对冰心的忆念	89
述 强	农娜·扎哈罗夫娜的中国情结	100
	一段浪漫的异国情恋，一位苏联少女在中 国半个世纪的人生经历……	
邢志远	援越抗美一烈士	112
贾俊学	活跃在早期戏剧舞台上的左明	122
阎 铭	我的父亲与“一号号令”	124
	1969年秋林彪的“一号号令”，当年曾一 度家喻户晓。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阎仲川 老人作为当事者，生前就此披露过一些鲜为人 知的内幕……	
姚里人	一幅全家照	137
刘 宁	奶奶与老叔	139
刘晓洪	丹心素裹	142
主 编		
刘瑞琳		
执行主编		
冯克力		
执行编辑		
张 杰		
特邀编辑		
丁 东		
邵 建		
美术编辑		
蔡立国		
技术编辑		
张 涛		
	封二 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廊房头条（海达） 中插 未经修葺的长城（方霖） 封三 清军之新 军士兵（方霖） 40年代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秦风 48） 1937年：张家口街景（孙明经 111）	
	本社对全部图片及文字享有专有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本书作 品，须经本社同意。	

·私人相簿·

我的伯父罗稷南

陈 炳



图① 1927年，陈氏兄弟在广州。左为陈绍韩，右为陈小航（罗稷南）。

在我的伯父罗稷南的一生中，有一些时刻是比较重要的。当然，在平时，当他每天上午坐在他的藤椅上伏案工作的时候，当他每天下午去公园会朋友下围棋谈天说笑的时候，他都表现出一种常年不懈的坚毅和慷慨不羁的豪放，这都可以说明他一贯的

气质，而且，如果 没有这

些日常生活的基础，他到了重要的时刻也未必就会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品格。但是，有些时刻是特别重要的。已经预料到或者并没



图② 1940年9月7日，罗的夫人倪琳与郑易里的夫人熊约春（中为郑的长女郑珑）在上海。

有预料到的重大时刻到来的时候，他一生积累起来的见识和勇气就会突然集中来，使他清醒镇定，坚强而自有余力地放出灿烂辉煌的亮光。这是他人生中最有意义的时刻。

1957年4月以后，毛主席以鲁迅为榜样号召中国人民响应他“大鸣大放”的号召，对共产党提批评意见，不久以后，毛主席又改为提出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展开“全

面反击”，把许多提了批评意见的人定成右派。在这个时刻，1957年7月，罗稷南有机会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他当面问了毛主席：“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这就是在一个重要的时刻向一个重要的人物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大问题。

毛主席和罗稷南关于鲁迅的对话，第一次是由贺圣模在1996年对周海婴谈到的。周海婴在他的回忆录提了这件事以后，贺圣

谟又在 2001 年 12 月对上海《新民周刊》澄清了他向周海婴讲到的一些事实，后来，注意这件事思考这件事的人就多起来了。

2001 年冬天，我曾经写信给周海婴，说明贺圣谟提供的不是“孤证”。我自己就曾经亲耳听见我伯父讲过他这次设问求答的情况。

1957 年 7 月，我在北京读到过报纸以头版头条报道毛主席在上海接见一些人的消息，看见罗稷南也列在被接见的人士中。1960 年，我从北大回上海，在伯父家养病住了几个月，听伯父讲过那次接见的情况。他说，毛主席进来坐定以后，有人递了一张在座人士的名单给他。毛主席看了名单，就挑了伯父第一个和他谈话。他们先谈了一段他们 1933 年在瑞金相见的事，毛主席又谢谢伯父翻译了《马克思传》，说他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后来毛主席问伯父有没有问题，伯父想了一下就问，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毛主席没有马上回答。他也想了一下以后才说，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他大概不是关在牢里，就是不说话了。

伯父怎么会问毛主席这样的问题呢？

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这是很多年以来在不同的时机都有人提过的老问题。但是，有了 1957 年夏天发生的事情，问题重提的含义就完全不同了。就伯父说来，他提的问题并不是偶然随便做的出来的普通事，这是他一生有了准备的结果。以伯父一生的经历见识和他立即直指实质问题的洞察力量，在有了机会当面问毛主席一个问题的时候，他自然会问出这样一个能够集中地揭开毛主席的思路和释解当时全部局势的大问题。

罗稷南原名陈小航，又叫陈子英，云南凤庆人。我们的老家远在这样一个小地方，偏僻闭塞，没有出过自成一局的大人物。不过，以自己非常有限的方式，我家按说也有救国救民，慷慨要有所作为的传统。袁世凯称帝以后，祖父陈宝航支持蔡锷的云南

起义，是蔡锷的主要助手之一，为他起草过非常重要的文件。伯父年轻时痛感民族危机的深重，1918年千里迢迢从凤庆赶到北京考进了北京大学要救国。他此后一生的摸索和奋斗都没有离开过这条道路。我的父亲陈绍韩也是一样，他1935年在武汉为革命就义。贺圣谟在1965年见到伯父的印象是，伯父是一位学者，但他对国家形势的关注很深切，这正好触及了我们家的传统。在北大教师中，伯父和梁漱溟最接近，和杨晦等同学是好朋友，在五四运动中也是奔走呐喊的先驱者。蔡元培兼容并蓄的教育方针大概给伯父的思路打下了终身的基础。他同情马克思的许多思想，但是对不同的思路也抱着开放态度。五四以后，痛心于军阀混战，伯父先在东北，后来又回云南和楚图南一起兴办教育，比较接近而且长期有来往的学生有艾思奇、郑易里。后来，国难深重，伯父又投笔从戎，支持蔡廷锴，当了十九路军的发言人和秘书，坚决投入了淞沪抗战。十九路军失败以后，又支持蔡廷锴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继续当秘书。在这段时间，他曾经代表蔡廷锴访问瑞金，和毛主席见面谈过话，和红军将领张云逸签订了条约，向被封锁的苏区供应了当时迫切需要的布匹、食盐、医疗设备和药品。这个条约的签字文本至少在50年代末还在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陈列着。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失败以后，他定居上海，从此就以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为人生了。

伯父翻译写作的生涯，用罗稷南做笔名。罗稷南是西班牙小说主人翁堂吉诃德的坐骑的名字。蔡廷锴瘦削高挑，有堂吉诃德的戏称，伯父支持蔡廷锴，常在左右，也得了罗稷南的戏称。后来伯父以罗稷南为笔名又有双重的含义。罗稷南瘦骨嶙峋，虽然堂吉诃德先生把它看成威武雄壮的骏马，实际上已经是疲弱无力的朽物。以驽马自居的态度流露了救国道路的崎岖在伯父心里留下的许多悲哀和痛苦。日本占领上海后，伯父、伯母和许广平等一起被捕入狱。国共内战爆发以前，伯父和许广平、周建人、



图③ 1948年秋，罗稷南（右）与友人郑易里在一起。前排的儿童是郑易里的子女。郑振铎、马叙伦等人一起先后创办了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民主》和《周报》等刊物。一个刊物被封禁又接着再办另一个。当时，军警宪兵在上海街道随时搜身，嫌疑人物即刻就地处决。伯父手提着一部无线电台从上海经过镇江渡江送到苏北解放区，交给当时在苏北主管宣传的冯定。伯父后来谈到他在苏北几个月的观感时常常说，他很佩服那些人的献身精神，但是对他们的思路不习惯。1955年，我回上海。伯父说，1950年，毛主席给他写过信，要他回云南做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担心思路不习惯，伯父没有辞也没有去，还是继续留在上海做当时称为自由职业的翻译家。事实上，这类自由职业者在解放后迅速消失，只有上海的

少数几个文化人还保持着这种比较独立的身份，并且多少还受到一些尊敬。我和伯父在 1960 年见面的时候，反右派已经过去三年，很多知识分子都已经学会敛声屏息了，伯父还是依然不改昔日的风度，痛诉教条主义的灾难，并且经常说起农村里正在发生的饥饿和死亡。我记得他和他的老友王亚南谈起这些事总是心情非常沉重。1964 年我们见面，谈到“大搞阶级斗争”，伯父也更加忧虑。最后一次见伯父，是 1971 年，尼克松访华前夕。我在河南五七干校突然接到我三叔的电报，说伯父病危，要我立刻回上海见一面。宣传队的领导不肯让我走，是我说了一些我平常不会说的话才勉强放了我。久别重逢的上海还有一些上海的气息，只是满目都是年久失修的破落，到处都有一种好像被洗劫以后的萧瑟和悲凉。伯父已经病得只剩一把骨头了。他不久前才得到允许从干校回上海，回到上海就不能起床了。一见面他就说，你知道，我的病是癌。知道我们就不说这些事了。他显然不愿意谈病痛。喘息了好一阵，他又说，尼克松就要访华了，历史也许会有些改变。我希望中国有些改变。经过了这些事，我们要学到一点东西，否则就白经过了。他要我讲讲我学到了一点什么东西没有。我知道他的话包含许多没有说出来的意思，是和他一生思路有关系的，只是我哪里有心情谈这些事。第三天临别，我知道我已经没有可能再请假出来，不过我还是跟他说，我来年春天再来看他。他听见了，但是只是默默地看着我，什么都没有说。我们心里都明白，这就是生离死别的永诀了。

伯父在 1971 年 8 月 12 日去世，73 岁。

我年轻的时候，伯父常常说，在我们老家凤庆山区，牛车的轮子是方的，因为担心下坡的时候车子刹不住。后来他到北京前经过武汉，第一次看见汽车，发现汽车不但可以慢慢地下坡，而且会转弯，实在是吃惊得目瞪口呆了。所以，人应该见世面，学新东西。不见世面不知道。如果不出来，怎么能知道世界上会有

像汽车这样一种你想象不到的东西呢？你不知道的东西，你怎么会想得到你应该知道呢？有时候饭后出去散步，他也常说，房子太多了，看得见的天只有一小片。到开阔的地方，才看得见天有多大。有一次去国际饭店，他又说，在高楼看天天就更宽了。我初中写作文把伯父的话写到作文里，我的国文老师魏金枝，伯父的朋友，鲁迅先生教导过的青年，把我的作文告诉伯父，伯父高兴得哈哈大笑。我父亲陈绍韩是朱总司令在云南讲武堂的学生。南昌起义以前，朱总司令在南昌做警察局局长，我父亲是北伐军市内驻军的营长，他们有来往。父亲在云南也是1927年以前的老党员楚图南的学生。1949年，我在北京去翠明庄见楚图南。楚图南说，他要见朱总司令，送我去苏联受教育。伯父知道以后对我说，你不能靠父亲，要靠自己。你有出息，不需要靠父亲；你没有出息，靠父亲有什么用？我考北京大学以前，想考哲学，或者天文。伯父说，你只认识方块字，只有一双眼睛，一对耳朵，一张嘴巴，一个脑子，你就会以为世界就是方块字讲的那种样子。如果你学好了一种外文，你就有四个眼睛，四只耳朵，两张嘴，两个脑子，你知道的世界就比现在大得多了。大二的时候，我发表了一篇论《呼啸山庄》的文章，我后来的老师卞之琳在文章中夸奖我。伯父说，你不要急于求成，不要有机会主义，要扎实地打好真才实学的基础；又引诸葛亮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伯父谈得最多的话题之一是“党八股”。他常常说，他最喜欢的毛主席著作就是《反对党八股》。他不知道为什么做领导的会喜欢让人讲这种八股文。头脑僵了，中文的文字之美扔掉了，文化再这样下去就完了。他又经常告诫我，学外文的也要学好方块字，特别举出《聊斋》、《左传》、《史记》和《世说新语》要我细读，读通了文，心就得到滋养了。初一的时候，伯父教我用英文背歌德的《浮士德》：“没有在悲哀中咀嚼过面包，没有在哭泣中等待过明天，这样的人不会知道你——天的

力量。”这种痛苦出智慧的思想我到很晚以后才稍微有一点明白。

伯父一生都是有追求，有骨气的人，从来不苟且，从来都敢于怀着救国救民的抱负，赴汤蹈火，承当重任。他为人慷慨豪放，独立不羁，思想开放，心胸广阔，这样，在 1957 年那个重要的时刻，伯父才问得出来他问了的问题。

所以，伯父的思想人格是前后一贯的。

伯父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有很多事实。除了自己奔走，他还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弟弟。但是，革命胜利以后，虽然一样抱着热情和期待，他反而处处留意要独立，许多事不肯跟着走，荣誉和恐怖都不能勉强他跟着走。难怪有的人会称他为“无轨电车”了。

有一年，伯父对我说，世界上任何主义都没有不会变形的实体。一切主义都经过不同人的解释，变成了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马克思说过，他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他又说，《马克思传》的作者梅林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是社会民主党，他有很多翔实的事实和重要的观点，但是他的观点并不完全和列宁斯大林解释的马克思主义一样。你不要以为什么东西标上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的名字就完全符合一个什么主义的实体了。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之一就是以为只要引用了一个什么主义就有了根据可以把人处置于死了。

伯父也曾经说过，他最喜欢的另一篇毛主席著作是《反对本本主义》。如果说这些年伯父的思想有一个基本的主题，这样的主题就是反对意识形态的封闭、僵硬、武断、粗暴和盲从。在伯父看来，意识形态的狭窄和偏执是丧失理智的。1960 年，我在上海养病的时候，上海作家协会正在对人道主义召开持续了几十天的大批判。伯父每天下午开会回来以后有时候很长时间坐着不说话，有时晚饭以后才开始说点开会的情形。“什么好东西都要打倒。自己什么都好，旁人有一点好的就不能容忍了。心胸连一



图④ 罗稷南在上海。

点差异都不能容忍怎么治天下。”“这是完全的疯狂，一点理智都没有了。”有一天他进门就笑着说，“他们批得正在起劲的时候，我站起来说，人道主义有好东西，你们不能随便批判，把他们弄得不知道说我什么才好。”伯父那天不知触怒了多少人，使他几天以后和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以后就受到非常难堪的凌辱。其实，伯父不过表现了一点抚痛自慰的幽默感，只是一个失掉了幽默的世界怎么能容忍。又有一次，他说：“我是悲观主义者。他们要把人关死在铁桶里。这样下去中国还有什么希望。”伯父的情绪



图⑤ 1957年，罗稷南在书房。

参加的批判会上，罗稷南说：“《海瑞罢官》是文学作品，描写的是明朝的好官海瑞，和庐山会议根本没有关系，充其量只能算一个可供讨论的学术问题。”“农民起义是暴乱。只要是接替前人的统治权，取而代之，不算是起义，也不是革命。”“工农兵的文化修养不高，他们的意见绝不能当作经典看待。”

已经是什么时候了，伯父好像连中国在这么多年发生了什么

是让人担心的，我有一次劝他坐着听听少说话。伯父静静地看着我看了半天才慢慢地说：“我是走过江湖的，我知道这些事，但是我不会敷衍，也不愿敷衍。”

不愿敷衍，王西彦80年代初期在《随笔》的文章里有一些记载。

1965年冬天，上海文艺大会堂，在姚文元有时也

事情都不知道，对威胁恐怖都没有感觉。他在这些年的“运动”里学到了什么呢？

伯父有一次长叹了一口气说：“曾经沧海难为水。”他做事讲话虽然经常好像都只是听从自己的本性，直朴率真，但是他经常思考，回顾，作选择。他不是没有见过明哲保身，不是没见过随风转舵，不是不知道一个人为了说一句真话要付出什么代价，也不是没有见过沉默。“非不知也，是不为也！”

伯父并不是一位接近自然而心性素朴的人，不是头脑简单而不能明了复杂义理的人，也不是没有见过大世面的人。只有素朴而没有见识的人是无力涉世的，只有见识而没有素朴的人是容易变迁的。伯父是我们云南高原的赤子，但是他探索过人类文明的精华，经历过大流血，大失败，大奋斗，他是一种由于经验见识的文化更加深邃而又重新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到率真的人。世界上有僵硬偏执的教条，也有比较接近于自然而不会违背人类良知的省悟——“天的力量”。我不知道，在世界已经疯狂的时候，是什么力量使伯父有能力长期保持着没有丧失理智的清醒？是不是这样的力量？是不是这样的力量？不是这样的力量怎么能在心里拥有天空这样开阔的大境界？

社会对人的强制是经常到处都存在的，权力、金钱和特殊的形势都有可能强制人，但是，在正常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严重的危机中，一个人能不能根据自主的意识作出负责任的决定，这也是一个人是不是成了人的重要尺度之一。其实，在我看来，伯父陈小航并不是老马罗稷南，他是堂吉诃德。他的言论和行动像堂吉诃德一样充满了不识时务的呆气，是一个不通世故的愚人，但是，伯父并不是和风车作战，他是和一种几乎毁灭了中国的罪恶在作战。他已经站不起来了，悲心在流血，但是他还是在讲话。伯父这几十年来受到过许多聪明人的挖苦、嘲弄和迫害，然而，事过境迁以后，是什么人显得更加可怜，更加可笑呢？我们许多



图⑥ 1964年，罗稷南在家中。

中国人不幸都有幸存的罪恶感，我们都为我们幸存的适应付出了代价。伯父没有辱没自己为人的品德，保持了自己做人的尊严。他知道暴力非真理，认出了人群的愚妄，真正是一个宁可受孤立

受迫害也要负责任的人。想起了伯父和像伯父一样受到了挖苦、嘲弄和残酷迫害的许多好人，我们现在又怎么回答自己呢？我们沉沦的精神创伤为什么现在会这样难以平息地使我们感到痛苦呢？

伯父在病床上曾看着我对我说，经过了这些事，我们要学到一点东西，否则就白经过了。他要我讲讲我学到了一点什么东西没有。这个问题，我到现在有时还是感到惘然。

我把伯父饱经忧患以后在他人生的最后几个月要我回答的问题转给我尊敬的读者。

征 稿

《老照片》是一种陆续出版的丛书，每年出版6辑。专门刊发有意思的老照片和相关的文章，观照百多年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对稿件的要求：所提供的照片须是20年以前拍摄的（翻拍件也可），且有一定的清晰度，一幅或若干幅照片介绍某个事件、某个人物、某种风物或某种时尚。文章围绕照片撰写，体裁不拘，字迹工整，传记、散文、随笔、考据、说明均可。

编辑部对投寄来的照片，无论刊用与否，都精心保管并严格实行退稿。稿件一经刊用，即致稿酬。

来稿请寄：山东省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山东画报出版社
《老照片》编辑部

邮 编：250001

E - mail：1407f@371.net

电 话：(0531) 2060055 转 5410 (编辑部) 2053182 (发行部)

邮购办法：请汇书款至上述地址，并注明所购书目。

邮发代号：24—177